

讀黃一農，《兩頭蛇：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
新竹：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5。557 頁。

祝平一*

中西文化交流史在臺灣並非顯學，自方豪(1910-1980)等前輩學者之後，此一領域的學者屈指可數。但 2005 年卻是臺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豐收年，出版了兩本具有里程碑作用的鉅作。即黃一農的《兩頭蛇：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以及李爽學的《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》。兩書風格迥然不同，各有所擅。

黃氏本以研究十七世紀的曆算與火炮史聞名，而此時曆算與火炮的輸入，天主教教徒扮演重要腳色。因此從十七世紀的曆算與火炮，進而研究當時的土人教徒，乃是必要的進程。本書便是作者在其舊作的基礎上，重新詳校、增補，並詮釋當時教徒所面對的文化選擇。黃一農的作品以精詳的考證見長，密不透風的史料，搭成一座璀璨的七寶樓台。此書甫出，即受到海內外名家品題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。然而此書不僅映對著臺灣在此領域的相對沈寂，也映對著中國在此領域的喧囂。

中西文化交流史在中國是熱門的領域。誠如周振鶴所論，傳教史的課題「集中在大人物與大事件」，像「傳教策略」、「中學西傳」、「歐洲的中國熱」、「歐洲人的中國觀」、「歐洲的中國庭園」等論

*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

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複。其實問題不僅在於論題重複。而是目前大部份論文中表層式的書寫，未能挖掘新史料，也缺乏新的視野，才是令人難耐之處。即使是有辦法接觸新材料者，亦常只是以材料公布的形式寫作，甚少就歷史脈絡對材料進行更多分析。歷史乃重寫的藝術，寫大人物大事件，可能使人重新理解歷史上重要的課題；寫小人物小事件，則能拓開歷史的深度。畢竟，不僅只有大人物才會活過，許多活在歷史幽暗的角落，而為人所遺忘的小人物，反而可能讓我們理解歷史的殊異性與複雜的程度。本書許多人物如瞿汝夔(1549-?)、王徵(1571-1644)、韓霖(1596?-1649)等大人物並不乏人研究。韓霖的名字在方志中被挖改，南明重臣的奉教與乞師等，前輩學者也皆已指出。但黃一農對這些大人物，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和歷史脈絡，使我們獲得新的歷史理解；遑論該書中小人物所構成的歷史細節，更增加了我們理解十七世紀中西文化最初的接觸的複雜性。在成千疊萬的論文中，黃一農的新著最重要的貢獻就在打破中文學界不斷「永恆輪迴」的惡夢，逼著學者必須站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，考察問題或挖深材料，而不是重覆別人用過的材料和論點。

書名為「兩頭蛇」，本身就是個有趣的意像。「兩頭蛇」典出賈誼(西元前 200-前 168)的《新書》，明代也借來罵人首鼠兩端。但明末的教徒孫元化(1582-1632)卻以之自況，而黃一農則借之比喻教徒所經歷的衝突，創意十足。本書共分十三章，第一章討論傳教士來亞洲傳教的歷史背景。這章看似平凡無奇，也是一般中西交流史的開場白。但黃一農使用大量的二手研究後，提出「適應」策略其實是傳教士來亞洲後的普遍現象，將中國的中西交流，置於世界史的架構中。第二章考證天主教徒瞿汝夔及其「家難」。「家難」使得瞿氏離家出走，並促成了瞿氏成為利瑪竇(Matteo Ricci, 1552-1610)第一位信徒的機緣。第三章考察了許多不同立場的明末士人與傳教士間的往返，描繪當時傳教士

所置身的士人世界。第四章討論王徵在宗教與性道德間的艱難處境，進而點出娶妾問題對有心奉教士人所產生的困擾。第五章考證魏學濂(1608-1644)降李自成(1606-1645?)事，並以「十誠」中勿殺人作為魏學濂可能未死節的輔證。第六至八章則與韓霖和絳州的天主教發展有關。這幾章考察了韓霖降闖，他的交遊與所著的《鐸書》和當地士人對天主教與韓霖家族的反應。九、十兩章考察南明宮廷的天主教信仰與其向教廷求救的事件。十一章分析和禮儀之爭相關的人物、文獻，以發掘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「中國教徒的聲音」，十二章則是討論禮儀之爭中有關「上帝」稱號的問題，即所謂的「用辭之爭」(term controversy)並指出了「禮儀之爭」其實深陷於當時教宗派的鬥爭中。第十三章則是追溯「兩頭蛇族」的宿命，以理解在文化夾縫中的人物。

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教徒的交遊考，讓一些不太知名的歷史人物，以教會史為基盤，重現舞台。在這方面，本書可補方豪《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》之不足。本書所附的索引詳盡，使用方便。書中有關王徵和魏學濂兩章，則提出了一個有趣而討論不多的問題。亦即當時中國教徒，在傳教士不多，且常無法蒞臨指導下，如何守教規？傳教士如何以誠律來規範教徒？王徵和魏學濂都面臨李自成起義，一選擇了自行在天主堂中餓死，彷彿十誠對他並沒有什麼影響；另一則選擇了事闖。生死、守節之間，二人選擇不同，到底受到教誡多少影響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是否像娶妾這種外顯的形式，傳教士較易控制？而像生、死這類內心抉擇之事，無法受到傳教士監督，不但較難判斷教規的影響？第一代的奉教士人除了盤根錯節的人脈外，他們的宗教實踐為何？當是要進一步深究的問題。

本書的最大的特色在於「視覺性」的經營，作者要讀者無保留地看到他所走過的路，所用的材料，乃至他所建構的歷史。作者不但顯示他歷史實踐的過程、乃至一位身兼父親、丈夫的角色，都顯示在讀

者眼前。每章文末的附錄，通常是作者對自己研究的反省，從中令人想見作為學者心無旁騖，恣意研究之樂。這些小文顯示了歷史學家面對自己錯誤時的挫折，和發現更多材料後獲得的快感，顯現黃氏很細心地在營造自己的風格和形像。另外，文中插入各種附錄，以補充歷史細節。這些書中的方框，很多是既有的研究成果，原本可以註腳的形式交代，但黃氏卻以之來讓一般讀者能理解更多的歷史細節。這種形式筆者只在 Anthony Grafton 的 *New Worlds, Ancient Texts* 見過，但 Grafton 的主要目的是補充一手材料，以為一般讀者導覽；黃氏大膽採用相同的手法，足見他在創新寫作形式之勇。這些插入的附錄有些是教導人如何作研究，令人想見當初想要將金針度與人而翻譯《幾何原本》的徐光啓(1561-1633)。黃氏心目中的讀者顯然不只是一般行家而已，還企圖使該書成為入門者的導引。由於作者想涵括所有讀者群的宏圖，使得書中的資料層次混雜，不過這些資料對於該書「視覺效果」的營造卻很重要，尤其是「王徵與妾」的附錄(頁 171-174)，可和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的《王氏之死》(*The Death Of Woman Wang*)書末描述王氏死前一段的精采文字比美。本書的種種細節、插入附錄中歷史背景的說明、圖證，也是為了「視覺性」的目的，造成仿如親見歷史的效果。「視覺性」的經營可說和黃一農終生夢想將明、清轉折的大時代拍成電影有關。筆者衷心祈祝他美夢成真，也期望他能和娜塔莉·戴維斯(Natalie Davis)一樣，寫出有關電影和歷史的論著。

另外黃一農也非常有前瞻性地提出「e-考證學」的問題。現在各種資料庫大力發展，以及從 internet 上所能找到的各種資料，比起以往只能靠翻書、詳讀、作筆記的時代，有效太多。如何有效地使用資料庫，的確是現代史家面對的一個大問題。更何況現在年輕一輩的成長環境中，電腦和資料庫已幾乎是身體的一部份，且這一代的學者也必須面對隨著電腦好處而來的知識爆炸的焦慮，思考「e-考證學」的

未來，此其時矣。不過黃氏除了例示如何進行「e-考證學」和對「e-考證學」的前景表示審慎樂觀外，並沒有提出更多的看法。

其實黃氏措詞相當謹慎，沒有用「e-史學」，因為歷史學當然不止是考證。除了查找資料外，史學主要還是讀和寫的藝術。尤其是文本形式、敘述模式等課題，無法從一條條零散的資料見出。更何況有時書籍本身便能訴說很多故事，而這無法取之於虛擬世界。其實黃一農的功力得自勤於搜羅資料，借助資料庫不過其餘事。黃氏本人也相當注意版本的問題，這些都不是資料庫或 internet 所能取代。何況和教史相關的材料，近年來雖然出版甚多，但仍有很多文獻仍存於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。中國學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會一直重複舊觀點與舊材料，也和舊籍之獲得不易有關。也許歷史這個靠翻書的行業，就像 Bruno Latour 所說一般：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。